
美國槍械暴力的問題：沒有共識，只有特殊主義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美國在不同州份、不同場所發生了一連串源自不同動機的大規模槍擊案，造成多人傷亡。反對加強槍械管制和背景審查的人仍然不為所動，仍然好像唸經一樣，重複同樣的論調：「人們將這些悲劇政治化，企圖去剝奪守法公民的擁槍權利」、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槍械，而是在於心理健康問題」。對於這些藉口，過去筆者曾經寫個不少文章去反駁，在這篇文章裏面，我嘗試從心理學角度去剖釋槍管失敗的原因。

在政治光譜上傾向於民主黨的加州、華盛頓州、內華達州、緬因州，都曾經推出過擴大購槍背景審查的議案，在公投前民意調查顯示幾乎是一面倒贊成，但是開票結果卻與民調出現了極大落差。例如 2016 年加州民意調查顯示，91%受訪者支持加強購槍背景調查，結果公投的支持率僅有 63%，2014 年華盛頓州關於類似法案的民意調查和公投結果亦有 81%對 59%的巨大差別，2016 年內華達州、緬因州亦產生了 86%對 59%、83%對 48%的鴻溝。

這種落差可以有不同的解釋，其中一個可能性是：大多數贊成嚴格背景審查的選民沒有投票，但這種解釋並不圓滿，若果人們關注槍械氾濫威脅自己的安全，他們沒有理由會錯過改變立法的機會；另一個可能性是：那些民意調查收集的數據存在著巨大誤差，這並不是樣本偏差而無法反映整體民意，真正原因可能是受調查者口不對心，在社會科學裏面，資料的準確性往往



受到「社會期望」（social desirability）的影響，為了顧全顏面，人們在接受調查時可能會選擇動聽的答案。在電視播出受害者家人呼天搶地的畫面之後，如果我表示反對加強槍械管制，那麼我便好像是麻木不仁；若果表示支持，我會站在道德高地。

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發生過同樣的情況，在投票之前大部分民意調查都顯示出希拉里將會獲勝，最後竟然大熱倒灶。一個可能的解釋是：希拉里的對手特朗普發表過很多頗具爭議性的言論，特別是《進入荷里活》這段影片曝光之後，很多人都跟他保持距離。說穿了，選民在回答民調時只是說出符合社會期望的話，在投票站才表達出真正的想法。公平地說，這並不是美國人獨有的問題，華人圈子亦有這句潮語：「口裡說不，身體卻很誠實。」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民意調查的結果並不能作準，美國社會在槍械管制上仍然未達成共識。有些人甚至不會介意自己的形像是否涼薄，在六月初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，討論制止槍械暴力的議案，佛羅裡達州眾議員史杜（Greg Steube）透過視像出席會議，他批評那些法案將會剝奪第二修正案賦予人民的憲法權利，跟著他逐一展示出自己收藏的槍械，德克薩斯州眾議員希拉·李



（Sheila Jackson Lee）說：「我希望這槍沒有上子彈。」史杜回應說：「我是美國人，我在自己的房屋裏面，我可以用自己的槍做任何事情。」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說話，若果那些槍裝了子彈而走火的話，他可能會誤傷家人。「我是美國人」這句話是關鍵，彷彿這個身份賦予他可以不管他人死活、為所欲為的無限自由。請讀者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存心執著史杜的一句話去無限上綱、大造文章。事實上，已經有無數學者和評論家指出了這種美國特殊主義（American exceptionalism）、美國人優越感的問題。

在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紐西蘭發生了大規模槍殺案之後，當地朝野很快便達成共識，通過立法去防止悲劇再次發生。舉例說，1996 年一名槍手在澳洲塔斯馬尼亞一

間餐廳射殺了 35 人、傷了 23 人，澳洲政府馬上通過了嚴厲的槍管法案，自此之後澳洲再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槍擊案。但每當筆者提起外國成功的經驗時，一般人的反應是：「這裏是美國，我們是美國人，美國有特殊的歷史和文化……。」坦白說，所謂特殊主義其實是空洞無物的，每個人、每個團體、每個社會、每個國家、每種文化都是獨特的。有趣的是，特殊主義並不是很特殊，有些專制政體應用類似的理由拒絕效法民主國家，例如推搪

說自己有特殊的國情和文化。說穿了，特殊主義是一種維持現狀、維持特權、建立優越感的心理防衛機能。

筆者悲觀地預測，除非大部分美國人願意放下特殊主義，否則無論在國內發生了幾多次慘絕人寰的槍殺案、在外國有幾多成功的經驗，我恐怕美國社會在應付槍械暴力上只會原地踏步。

2022 年 6 月 7 日

原載於北加州版《號角》

圖片來源：Slowking4

[更多資訊](#)